

论参照性权力视角下大学校长职业的卓越发展

王 飞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在“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命题中,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在重新定位其职业发展之时必须建构一种“参照性权力视角”。该视角的构建为大学校长职业向教育家发展找到了与教育家内涵同构的权力内在性及其必要性。这种内在性与必要性形成了大学校长职业卓越发展的时代性条件,它要求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与大学校长自身遵循“参照性权力”更重于“职位性权力”的法则,经由“职位性权力”向“参照性权力”位序转换助推“去官僚化”与“去行政化”来构建大学校长职业卓越发展之道,进而构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并据此构筑中国大学主体性发展的理想图景。

关键词:参照性权力; 职位性权力; 大学校长职业; 教育家

中图分类号: G6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2)02-0064-05

不管当代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在中国大学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与产生了何种作用,我们都不能停止对其职业发展进行反思与检视,“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命题就是对其职业的未来发展做进一步理性思考的回应。经笔者研究认为,在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命题中,中国大学校长在重新定位其职业发展之时必须建构一种“参照性权力视角”。参照性权力是一种促使大学校长通向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内在性权力与必要性权力,中国大学校长职业的未来发展之道需遵循“参照性权力”更重于“职位性权力”的法则,经由“职位性权力”向“参照性权力”位序转换去构建,进而构建中国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并据此构筑中国大学主体性发展的理想图景。

一、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性权力的内在性

内在性是回答什么是大学校长的参照性权力的问题。参照性权力属于权力体系中的一种,回答什么是参照性权力首先要认识什么是权力及权力体系。据组织行为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认为,权力主要分为两大类五种权力。两类即指职位性权力(外在性权力)与个人性权力(内在性权力)。前者体现为三种权力:强制性

权力(惩罚权)——因为能剥夺他人的有价值的东西或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而获得的权力,建立在惧怕基础上;奖赏性权力(奖励权)——因为能带给他人某种积极的利益或帮助他免受消极的影响而获得的权力,和前者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法定性权力(合法权)——一个人通过组织正式层级结构中的职位获得的权力,包括前两者。后者体现为两种权力:专家性权力(专长权)——来源于专长、技能和知识;参照性权力(模范权/统御权/感召权)——其基础是对于拥有理想的资源或个人特质的人的认同。^[1]实际上,个人性权力中的专长权是从属于参照权的,因为得到认同的拥有理想资源或个人特质的人,自然是拥有专长、技能和知识的精英分子。

权力不管怎么区分,在其实质上都是指一个人(A)用以影响另一个人(B)的能力,这种影响使B做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一个人可以拥有权力,但不运用权力。权力是依赖的函数。B对A的依赖性越强,A的权力就越大。这个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主体的向度,权力行使者能够去做某事的能力;客体的向度,能够对对象进行支配或控制的能力。简言之,“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个人性权力中的参照性权力对于推动

收稿日期: 2011-10-10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BIA090045); 2011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1_0014)

作者简介: 王 飞(1982-),男,云南曲靖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史。E-mail: wf2912247@126.com

和维护一个组织的发展具有职位性权力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作用。参照权来自于一个人的个人素质。相反，职位权中的强制权、奖赏权和法定权基本上都来源于组织因素。人们都更愿意接受和认可那些他们崇敬的人或拥有他们所期望的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依仗位置来决定奖酬或强迫他们的人），因此，有效地使用参照权应该导致更高的员工绩效、承诺和工作满足感。事实上，人们发现，参照权是与有效的员工绩效最强烈、最稳定的相关因素。知识是使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最有效的基础。能力有很强的号召力，作为权力的基础，它可以带来群体成员的高绩效。在这个意义上讲，参照权“是一种超凡的魅力。如果一个人具备参照性权力，这个人就具备了有影响力的个人特点，能够影响他人去做你想做的事。”^[3]

通过大学组织来透视上述权力体系，尽管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不同于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权力，但大学组织本身也是个复杂的权力系统，其社会成分非常明显。从一开始，当代中国的大学就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场所而被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镶嵌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的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体制而被建立起来的。行政事业单位制度是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供给制（一种中国特色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中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整合进当代中国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整个单位体系都不是建立在法律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管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基础之上。可称之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复合体”。^[4]

在这种再分配的事业单位体制下，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上级组织）是大学资源的主要或唯一供给者，而资源输入是大学生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没有自身独立的权力范畴，必须依赖上级主管部门才能生存和发展。中国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政治体系的组成元素之一。作为大学组织主要领导的校长的权力的获得、保持与权力运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政治权力运行的延伸，也具体体现为大学校长的职位性权力与参照性权力两大类。推动与维护大学组织的发展，核心还在于这套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利益的表述与再表述。权力分配与利益表述的效能

取决于职位性权力与参照性权力之间的联结，这个联结点是大学校长。借此，职位性权力与参照性权力都是大学校长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职位权是其权力的外部基础，参照权是提高其领导效能的内在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讲，与教育家内涵同构的参照权的内在性是指，只靠发挥职位权不能支撑起一个大学校长向教育家的成长与发展，只有在职位权基础上发挥参照权才能促使一个大学校长向教育家的成长与发展。换言之，参照权在大学校长向教育家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唯一性的作用。

二、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性权力的必要性

必要性是回答为什么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必须需要参照性权力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你想在这个国家中得到什么，就得从学校中做起。”^[5]把这句话窄化一点说，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安排，你想从这个国家权力中得到什么，就得从大学制度中做起。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权力体系中看到一个不自治、不自由的大学，也很难在一个倾向于专制的权力体系中看到一个高度自治与自由的大学。

由于大学有着自己的基本格调，有着自己作为大学的主体性资格，由此，大学的顺利运转与发展，需要有其自己的权力与权利。历史地看，塑造大学的治理主要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大学自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大学在自发活动中形成的，是自然的，这个力量自下而上地建构着大学的自治秩序。另一种是国家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自上而下地建构大学的他治秩序。当代中国大学及其大学校长的治理力量是后一种力量塑造的，大学校长的职位权是一种外在性权力，是一种赋予的，是一种嵌入式的权力，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是国家与政府这个外在于大学组织的主体对大学与大学校长这个客体的权力编织，如绝对的大学校长政府任命制，政党的政治权力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大学学术性组织所行使的压迫权，大学校长等领导者对大学其他管理者所行使的强制权、大学教师对学生所行使的强制权。外在性的职位权根源于政党对组织主客体的二元划分，“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分

割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社会思维模式在教育领域中的典型表现。”^[6]这种划分以“占有性”与“物化性”为主要特征,以统治和征服为根本治理方式,而不是以“人化性”为依归。因此,大学校长的职位权对于政府部门来讲,是对大学校长的一种任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与控制上的便利,这时的大学校长是权力客体,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权力主体。在大学内部,校长又是权力主体,教师、学生则是权力客体。大学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大学成了政治经济的工具,丧失了自身应有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自主性,大学校长仅是大学官僚机器中的一个执行者,只是一个对外在于大学的政党负责,对大学内部监控的平庸管理者。

据前述作为内在性权力的参照权的内涵得知,人们都更愿意接受和认可那些他们崇敬的人或拥有他们所期望的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依仗职位权来决定奖酬或强迫他们的人),因此,有效地使用参照权应导致更高的管理绩效与职业发展和工作满足感。大学校长的参照权是支撑其职业发展的理想形态的权力元素,它建基于大学校长的特殊个性、品格与个人魅力之上的内在性权力,建基于主体间性基础上。高度具有参照权的大学校长是一个拥有优秀个人品质和超凡魅力的领导者,这样的大学校长胆略过人,勇于创新,知人善任,富有同情心,具有感召力,善于巧妙、艺术地行使权力,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依从,由此而来的影响力也比较持久,往往使得周围的人尊重他、信赖他、认同他、景仰他、崇拜他、追随他,甚至达到模仿他的行为和态度的程度。因此,前述说参照权又可叫统御权或感召权。中外历史上卓越的大学校长无不是具备这种参照权的领导者。拥有这种权力的大学校长不再是大学的监工与平庸的管理者,而是教育家型的大学领导者。在这种权力设计中,是基于主体间的真诚交往与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的关系、认同并接受的关系,大学校长的参照权来自于大学组织内部对他的认同接受,是大学集体认同的结果,不取决于行政任命和经济酬赏,大学校长代表的是大学组织的共同愿景,大学组织将这种愿景认同的权力委托给校

长,由他在大学集体认同的共同体文化、共享价值观、意义之下发挥作用。如果缺失了这种大学集体认同的参照权,其职业的卓越发展就失去了通向教育家的轴心。这就是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性权力的必要性所在。

三、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性权力的生成性

生成性是回答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怎么形成参照权的问题。参照权的内在性与必要性共同构成了大学校长职业走向卓越的时代性条件,要求整个高等教育体制及其大学校长自身遵循“参照权”更重于“职位权”的法则,经由“职位权”向“参照权”位序转换助推“去官僚化”与“去行政化”来构建大学校长职业卓越发展之道。借此,在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命题与实践这个命题中,作为支持大学发展的国家与政府,必须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学需要在良好的政风下才能生存。它的存在要依仗政治的关照。只有在国家关心的时间和地点大学才可能存在。国家让大学的存在成为可能,国家也捍卫着大学。”^[7]国家的这种关心必须倚重一系列完善健全的法理制度的制定与落实来转换现有的通过赋予大学校长一种高于或凌驾于其“参照权”的“职位权”来治理大学的权力施加手段,必须考虑大学校长职业在其权力运用中的特殊性:“大学校长的权力与政府权力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大学校长的权力是为维护真理至上而存在的;大学校长主要不是靠行政权力来行事的,为此,他常常需要藐视权力,并且唤起师生对企图超越真理之上的权力的藐视;大学校长更多地依靠文化及其力量或学术权力。大学校长职务的特殊性是由大学自身的学术理性决定的。大学不全在象牙塔里,但象牙塔在大学里。大学不仅追求真理,而且视真理至高无上;大学维护这种无上的地位,就是维护自己。作为大学的当家人看护学术地位,大学校长自然责无旁贷。”^[8]这里所说的“大学校长要藐视权力,唤起师生对企图超越真理之上的权力的藐视;大学校长更多地依靠文化及其力量或学术权力”的含义就是大学校长要不太倚重其职位权,而应强调参照权。从一部世界一流大学及其卓越大学校长的发展史来看,大学校长若太过于强调职位权中的法定权、强制

权或奖惩权（所谓的依法行事），则大学教职工的工作满足感低、大学组织气氛就差。大学校长如果强调自身内在性的参照权，则大学教职工工作满足感高、大学组织气氛较好、士气也较高。

因此，如此富有主体性价值的工作职业种类与与智慧挑战的大学校长职业，不需要国家对大学校长职位进行行政宰制，而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规定促使大学校长建设其参照权。让大学校长自身“随意”地去了解一所大学的历史、目标、价值观、能力，并在各种环境中找到关于一所大学是什么类型的大学、这所大学关心的是什么、这所大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问题。当然，这些富有智慧性挑战的工作，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大学校长在办学与治理大学中的主体性意识、主体性精神与主体性思想不可能在特定的大学场域内就能生成，而是来源于大学教职工的无数次对话，来源于所设立的一些对大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委员会的工作，来源于由大学行政管理部和教职工组成的领导小组的广泛讨论。大学校长的参照权就应在这些工作过程中生成出来，进而为大学确定一个科学的航向，并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发展方向。进而树立起大学校长真正的权威，权威来自于一种理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这种权威对象的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同与信赖以及服从。这就达到了霍布斯说的“权威的名气就是权威”^[9]的一针见血的观点。这种权威是一种居于参照权基础上生成的内在权威。而“如果没有内在的权威，就只能屈从外在的权威，而这种外在的权威仅仅是一种强制力。”^[10]参照权能促使大学校长自身努力去构建自己的内在权威，而职位权只能形成大学校长的外在权威。所以，遵循参照权的内在性与必要性，大学校长应在作为外在赋予的职位权范围里善于用权、敢于用权。同时，要充分发挥作为内在性权力的参照权的作用。可把振奋士气与提升大学校长影响力的权力运用方式概括为：参照权>奖赏权>强制权>法定权。

四、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性权力的指向性

指向性是回答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中参照权在权力体系里最终价值的定位问题。经“职位权”向“参照权”位序转换助推“去行政化”与“去

官僚化”来构建大学校长职业卓越发展之道有两个价值指向：首要价值指向与最终价值指向。

首要价值指向在于构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即构建大学校长健康的职业属性——指大学校长区别于其他职业而具有的本质特性。也就是大学校长职业在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与社会架构相吻合的、符合其职业特点与发展规律的那些与大学校长职业本身密不可分的性状总和。这种性状总和具体是指大学校长不是代表国家、不是代表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学自身的一支具有大学组织所认同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不受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不受任何个人、政党左右的且具有法定性、社会性、专业性（学术性）、专门性（职业化）、独立性（自由性）、自律性与自治性的独立职业力量。这种职业属性的内涵一方面等同于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内涵，从普遍意义上讲，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独立、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从大学校长这个特定职业角色上讲，“大学校长的那种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大学发展机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就是作为大学校长最典型的主体性。这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大学校长在与客体环境相互影响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自为性与自觉性，从而获得作为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和定位。”^[11]因此，经由“职位权”向“参照权”位序转换而构建的大学校长主体性与其职业属性两者的内涵是等同的。另一方面，这种职业属性的内涵与“教育家办学”所要求的内涵也是等同的，“教育家办学”可分为两部分理解，“教育家”是前提，“教育家”强调的是大学校长首先要成就自身，使自己成为教育家，“办学”是指大学校长在成为教育家后去办学，进而成就大学。“教育家”是大学校长成就自身的最高指向，是以大学校长自身的认识和成就为取向的，而这个对自身的认识与成就，无法限定于狭隘的生存活动或精神领域，惟有在认识与变革大学的过程中，大学校长成就自身才可能获得具体而丰富的人格魅力，换言之，大学校长要成为“教育家”，需要拥有主体性，成就自

身的过程也就是强化大学校长的个体性之维与内在性之维,个体性之维与内在性之维获得的过程也就是大学校长主体性与职业属性生成的过程。因此,发挥参照权的首要价值指向都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大学校长主体性与其职业属性。而其最终价值指向在于构筑中国大学主体性发展的理想图景。大学的主体性是:大学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文化晴雨表”^[12],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最高文化机构、最高精神象牙塔,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超越大学。”^[13]而大学校长的主体性与职业属性和大学的主体性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大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组织,而大学校长是这个历史生成组织中的核心灵魂人物。大学校长的主体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组织发展的主体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大学校长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程度,既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又是检验大学建设有无成效的尺度。另外,大学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校长,既决定于大学组织内部诸多要素的内在构成,同时亦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待大学的整体态度,尤其是取决于国家政府给予大学以及大学校长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的实际状况。代表大学校长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程度的提高,是政府宏观调控、社会广泛参与、校长自主治校、教授自主治学的前提、基础

和内在要素。如是,方可实现中国大学主体性发展的理想图景。

参考文献

- [1] 李硕豪. 权力博弈: 一所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故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1-22.
- [2] 丹尼斯·朗. 权力论[M]. 陆震纶, 郑明哲,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
- [3] 罗宾斯. 组织行为学精要[M]. 郑晓明,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 171.
- [4] 康永久. 知识输入还是制度重建: 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中国道路[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88.
- [5] 赵中建, 顾建民. 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34.
- [6] 张天雪. 校长权力论——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校层面的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235.
- [7]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3.
- [8] 张楚廷. 张楚廷教育文集: 卷4[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 89.
- [9] 波尔 P. 成穷校人: 学术者[M]. 王作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122.
- [10] 卡尔·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78.
- [11] 王飞, 王运来. 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路径设计[J], 中国高教研究, 2011(5): 29-32.
- [12] 沉睡. 世纪中国: 心灵互动中的时代图景[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155.
- [13] 姚国华. 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J]. 社会科学论坛, 2007(3上): 70-74.

University Presidential Excellence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ference Power

WANG F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educators-led university age” makes it necessary for today'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idents to redefin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a “reference power perspective”, which renders the president an intrinsic power in line with the essence of educators. It is a precondition for university presidents to develop their career. It require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presidents to follow principles of “reference power” rather than “position power” with the latter transforming to “reference power”, thus promoting “de-bureaucratization” and “executive alienation” to build a university president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Thi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presidential subjectivity, an ideal blueprint of China's progress in establishing university autonomy.

Key words: reference power; position power; university president career; educator

(责任编辑 赵蔚)